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溯源

——试论李大钊“根本解决”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素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李大钊以其睿智和勇敢,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他的思想引领时代前行,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此走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光明大道。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初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根本解决;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1-0014-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1.003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its Traceability to China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Li Dazhao's Thought of "Fundamental Solution"

WANG Su-li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China occurred when Chinese history was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history. Li Dazhao, as a great pioneer in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led the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onto the bright road of the Marxism social revolution. Li Dazhao's thought of "fundamental solution" was the initial solu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proposed by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it was also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hin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Marxism; Li Dazhao; fundamental solution; China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20世纪初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人类历史中出现了突破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而向世界历史过渡的大趋势^①。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中国从民族历史强行纳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使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步滑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经济上,中国成为资本主义海外市场和掠夺资源的场所,沦为资本主义经

济附庸的危机日益加深;在政治上,中国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帝国主义的殖民化政策,严重妨碍了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影响其政治目标的选择与实现;在文化上,由于传统政治秩序的瓦解,中国文化处于“失范”的状态中,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人们把对旧制度的否定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结合起来,试图创造一种“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的。李大钊以其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8页。

智和勇敢,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他提出的根本“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中国的再生之路,中国几代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洪秀全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前赴后继、历尽坎坷。他们向西方学习,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广泛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从人间“天国”、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曾经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民的注意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而要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不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的辉煌年代,而是在资本主义暴露了自己的危机并到东方寻找转嫁这种危机的时刻。中国人只能从自己民族备受屈辱的血淋淋的事实去透视西方文明。纵使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是甜美的酒浆,却“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①。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先进知识分子在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历史进行精心观察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在对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进行广泛了解和诸多比较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自由争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中国和世界应当走什么路,向何处去?在所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即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经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漠克拉西主义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②。在当时流行的众多学说中,他们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只是因为马列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决不是趋时髦”^③。这表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

纯的学理来接受,而是把它作为观察与改造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在当时,他们基本上是围绕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问题来进行理论探索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首先被他们所接受,以便从中寻找出中国社会改造的精髓和中国社会革命的真正出路。

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和主观条件的差异,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组织与理论准备上,还是在社会客观条件方面都遇到了显然不同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在理论和组织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交往,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形成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才逐渐向社会革命的要求转化。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建立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开始,到190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这中间经历长达20年的时间。在中国,如果以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在2年之后即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3年之后成立了中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经过了长时间的锤炼,而且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思潮进行的持久的论战中,使自己在理论与组织上日益成熟起来并健康地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理论条件。

其次,在社会革命的国情条件和革命实践道路的选择上,俄国和中国的“差异至今还是显而易见的”^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是不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情条件,但与中国相比,它基本上拥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俄国工业增长达到了最迅速的时期。尽管“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需打败一个阶级,它本国的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

②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③ 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9月28日。

④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6页。

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它本国的新生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战胜农村的历史”^②,这种说法虽未必精当,但俄国十月革命基本上沿续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即以城市武装起义为夺取政权的基本方式。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条件,“走俄国人的路”已成为共识,但究竟怎么走法,历史给他们提出了诸多难题。他们不仅要在理论上区分和确定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同时又要在实践中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及革命的依靠力量;他们不仅要批判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同时还要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在反帝反封建时代主题之下的多重历史任务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需要更敏锐的理智来判断和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

历史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的。但在最初传入时有两个特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介绍的初期,它不过是作为众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种,甚至被人们所误解,这就使得其传播过程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二,除李大钊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外,一般人视马克思主义为“诸子百家”之一派,并未当成“救国良方”^③。事实上,到了五四运动之前,这两个特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五四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构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直接前提,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也是中国人民经受了近百年剥削后对“殖民化”滋味体验的情感爆发。“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解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

因”^④。五四运动不仅使人们把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而且它所高扬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⑤,也把人们的追求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另外,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对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⑥。

因此,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准备不足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构成了双重困难,但也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更具有独创性,他们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正是这种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的伟大实践活动,为他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日益深入的基础上,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中提出来,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当然,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特别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李大钊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它的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396页。

②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③ 《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第28页。

④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⑥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1页。

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是合一的,即首先来自于李大钊所主张的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行社会“根本解决”的思想与主张之中。它不仅规定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基本途径,即以“阶级竞争”为政治手段。

五四前夕,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初步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他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①。稍后,在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又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他提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经济改造”。所以,李大钊主张必须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②。这一正确主张受到了实验主义者胡适的批评,李大钊则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作答。李大钊指出:“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十月革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根本解决的结果。在俄国“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③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李大钊并不认为“根本解决”是可以不受国情条件的限制去任意使用的,他认为:“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锐,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可以用这工具做起工来。”^④而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指出:中国以农业为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一处,家族繁衍,大家族制度特别发达;而“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

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⑤,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经济组织为基础构造的“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⑥。李大钊的思想和主张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反映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思想特征。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80年的理想与追求屡受挫折、西方的各种主义在中国惨遭失败之后的第一次深刻警醒。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提出来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初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理论建树。虽然他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但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却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以之为中国社会改造的指导理论的人,同中国后来产生的大量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有很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时代只允许他主动地而非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在1919年五六月间,该专栏先后发表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李大钊本人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认识工具去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

李大钊“根本解决”思想的形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时他基本上触到了中国革命必须

①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引《李大钊文集》版本同),第19—68页。

② 同上,第49—68页。

③ 同上,第37页。

④ 同上,第37页。

⑤ 同上,第178页。

⑥ 同上,第37页。

把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结合起来,即首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主题。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的政府“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李大钊痛斥“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②。李大钊把国内的封建统治者和为争权夺利混战不休的封建军阀看作是同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差异的“强盗政府”^③。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提出了在中国首先应该进行推翻封建军阀势力的民主革命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目前“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我们民主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④。李大钊的主张表明:中国人民进行反帝争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民族战争,就必须同时进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而在进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时,又必须进行反帝的民族斗争。这就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

李大钊“根本解决”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这一特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理论重心之所在。五四前后,马克思唯物史观十分突出地传播起来,成为一个显著的理论特征。这一方面是由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国际争端的焦点、国内矛盾激化的社会里,社会历史观更容易被人接受,并运用它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或多或

少地含有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如李大钊对“庶民”的重视,使他能比较容易地从西欧的革命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群众运动的威力和劳工的伟大,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⑤。如果再往深处开掘,李大钊早年对“民彝”思想的阐释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识,也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成份的吸收,反映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⑥。所以,从这样的思想历程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如此程度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另外,从政治思想的转变上看,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在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非“根本解决”的理想破灭之后产生的。这一转变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李大钊曾热烈追求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社会,这种民主政治如其所言,是“唯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⑦。而民主政治的主体,则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的中心势力,以为国本所托”^⑧。但是,这种期望通过政治改良而使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理想在现实中陷入困境。他在 1914 年就感叹“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⑨,而当 1917 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的破灭而惆怅,“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⑩。正如鲁迅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⑪1918 年 5 月,李大钊在一番深沉的观察与思考后说:“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 594 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 1 页。

③ 同上。

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 604 页。

⑤ 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98 页。

⑥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47 页。

⑦ 《李大钊文集》(上),第 157—158 页。

⑧ 同上,第 466 页。

⑨ 同上,第 96 页。

⑩ 《李大钊文集》(下),第 917 页。

⑪ 《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 455—456 页。

心,安慰吾人的性灵。”^①中国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采取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革命办法,中国近代社会的客观现实迫使人们抛弃非“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的道路。就此而论,李大钊由政治改良到社会革命的思想转变,就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嬗变的缩影。第二,李大钊的非“根本解决”的政治改良主义理想虽然破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上的追求毫无意义。作为中国的而非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之前必须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不对人类思想文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社会政治学说有相当素养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对李大钊政治思想上的转变,更应该从辩证的否定,即“扬弃”的意义上去理解,因为李大钊现代意识中的民主观念、法制观念、自由观念加深了他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可协调的矛盾的认识,才使他更自觉、更主动地寻找实现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途径。

三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与胡适的“实验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巨大分野。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并以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②。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

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③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④。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⑤,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⑦。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⑧。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从历史与逻辑的起点上看,李大钊所主张的“根本解决”与从中国“实境”出发的思想,一方面包含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的冲动,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一些理论原则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这些原则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法。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537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5页。

④ 同上,第113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⑥ 同上,第69页。

⑦ 同上,第711页。

⑧ 同上,第34页。

⑨ 《李大钊遗文补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①,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第二,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而是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

性。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中包含了这样几个成份: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走向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相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②。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其次,则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回眸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李大钊的思想如同一座引桥,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引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也因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而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李亚平)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 32 页。

② 同上,第 16—19 页。